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联合组织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于2016年12月12日至13日在日本召开中期讨论会。来自中国、美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及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学者就中等收入陷阱的度量与定义、中等收入阶段的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中等收入阶段的要素市场发育、对外开放与宏观经济政策等广泛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讨。会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

### 一 中等收入陷阱的度量与判定

中等收入阶段与中等收入陷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往往被混用。来自德国哈根大学的学者 Linda Glawe 和 Helmut Wagner 对此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同时，他们利用两套方法讨论中国是否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第一套方法是基于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从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角度看，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他们检验了以前一些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由于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不同以及数据来源的不同，无法做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判断。从多方观察角度看，不支持“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他们认为，从总体上看，这套方法有很大缺陷，更适用于做事后判断。第二套方法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触发因子分析。他们列出了18项触发因子，并从中确定了三项最重要的因子：出口结构、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从出口结构来看，中国表现很好；从能够获得的人力资本数据来看，中国的情况也不错；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缺少直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结果，但是与此相关的研发支出占比表现很好。综合以上分析，中国经济赶超的总体表现尚好，中国有潜力进一步赶超并成为高收入国家。

### 二 产业发展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产业结构的升级是重要环节，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性因素。本次研讨会深入讨论了在中等收入阶段各个产业部门发展的

特点与路径,以及新兴经济体结构转型与生产率提升的独特表现。来自日本兵库大学的 Jagannath Mallick 教授分析了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化、结构转型和生产率增长问题。他比较了中国和印度两国国内各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对中国和印度劳动力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再配置过程进行了分析。他发现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再配置能够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地区,随着劳动力在一产、二产和三产之间转移,该区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程度比中高收入区域更大。此外,他还发现外国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且显著地加强了实物投资和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因此,加强区域间协调合作,促进资源向落后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产业配置,可以提高落后地区的收入水平,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改善收入分配。

在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农业发展亟需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王美艳和贾朋的合作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总体上已经完成了解决食品供给问题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阶段,正处在解决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关键阶段上。劳动力市场变化和诱致性技术变迁使得农业生产中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稀缺性发生了变化,农业中大量使用了劳动节约型技术,劳动力投入不断减少,资本投入不断增加。但是,一方面,由于土地经营规模的制约,农业出现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显现出作为一个产业缺乏自立性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以农业产业特殊论为代表的传统观念禁锢了农业发展的政策思路,使中国农业开始走向过度依赖补贴和保护的道路,农业发展新阶段的任务迟迟不能破题。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城镇化战略,破除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妨碍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的体制性障碍,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在中等收入阶段实现基本工业化以后,如何通过提高传统制造业部门的经济效率提升竞争力,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群慧、黄阳华等的合作研究,深入讨论了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转换和中等收入陷阱与产业政策。他们的分析指出,当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重塑比较优势的严峻挑战,而工业和制造业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的趋势,甚至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而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制造业的持续升级是保持人均收入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今后,中国制造业应该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以效率提升应对成本上涨。产业政策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一是将政策资源导向通用技术和共性技术,引导市场向创新性、而不是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二是充分明确政策责任主体,提升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的精细化;三是根据不同的政策

措施的优缺点灵活组合，加强产业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相形之下，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教训值得关注。来自美国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的 Paus Antonia 教授在“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拉美经济的教训”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拉丁美洲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创新能力不足。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拉美国家奉行 30 年的“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政府失灵”，导致拉美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同时，形成了庞大的低效率非正式部门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滞后。拉美国家的主要教训表现为：第一，过于依靠市场被锁定于静态比较优势；第二，融入全球价值链并不会自发促进升级产业；第三，吸引外资并不会自发产生溢出效应或技术转移。她认为拉美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从国家层面对创新体系进行战略布署，包括加强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产学研合作，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强化金融系统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

### 三 中等收入阶段要素市场的持续发育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有赖于要素市场的持续发展，从而在不断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供支持的同时，降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都阳讨论了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市场发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问题。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经济增长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则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从中国当前的情况看，虽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发挥作用具有长期性，但对人力资本积累体系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通过综合利用加总数据、企业与员工匹配数据、住户调查数据，他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变与就业结构转变的模式具有独特性，对人力资本积累政策也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要求。因此，在中等收入阶段要关注技能需求变化，并根据劳动力市场提出的现实要求，动态地调整和改革人力资本积累体系。

来自北京大学的黄益平和中央财经大学的苟琴则讨论了中等收入阶段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与经济危机的关系。他们认为中国正开始新一轮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这是促进经济增长必要的政策选择。然而，伴随金融自由化改革，一些中等收入经济体曾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那么，中国的进一步金融自由化改革是否会引发金融危机？他们基于实证数据得到的跨国经验表明：第一，整体而言，伴随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

高，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等金融危机的概率反而显著地下降，同时银行体系金融脆弱性程度也显著降低，这一结果对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尤为显著；第二，渐进式金融自由化改革对于维持金融稳定尤为重要，激进式改革（如墨西哥1990年代初的改革）则显著提高了金融风险；第三，提高制度质量，特别是加强投资者保护、增强市场纪律，能有效降低金融自由化改革中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第四，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也能有效降低金融自由化改革中伴随的金融风险。因此，中国在进一步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继续保持渐进式改革，同时提高国内制度质量，适当提高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职能，以维持金融稳定。

#### 四 宏观政策与发展环境

经验研究表明，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结构变迁频繁的时期。合宜的政策环境将既有助于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也有利于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平稳的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晓晶对宏观经济政策扭曲、赶超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发现扭曲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一种是“原罪型扭曲”，即后发国家由于市场机制不成熟、市场体系不完善而形成的“天然”扭曲；另一种是“赶超型扭曲”，即后发国家出于赶超的需要通过强政府干预形成的主动扭曲。理论上，“良性扭曲”（favorable distortions）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存在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证据均表明，扭曲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在递减，特别是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其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并成为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因此，减少和消除扭曲是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根本路径。问题是，一些政策制定者并未认清扭曲的历史局限性，而热衷于保持扭曲。如果认为“适度扭曲”是必要的，同时这个“适度扭曲”又未能得到很好的界定，那么，政府越位这样的扭曲就会频繁出现。这些在赶超口号下所实施的扭曲，恰恰可能会导致赶超进程停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当前中国所最需要警惕的风险。

而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规模也会逐步扩大，如何在扩大开放、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的同时，管控外来的风险，对于很多新兴经济体而言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斌与北京大学邹静娴的合作研究，观察了进入后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经济开放度和对外开放政策变化的国际经验，讨论了开放政策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提出了对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调整的启示。他们认为，从贸易开放度和资本项目开放度来看，成功从后中等收入晋级到高收入的经济体开放程度更高，

未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开放程度更低。成功赶超的经济体从中间汇率制度中退出并转向浮动，未能成功赶超的经济体依然害怕浮动。

对国际贸易、国外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DI）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有助于鼓励竞争提高效率，有助于更充分地利用比较优势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这些领域的开放政策是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保障。对短期资本流动放松管制需要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具备浮动汇率制度（或者众多严格条件下的固定汇率制度），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制度保障以及贸易自由化等前提条件后，才能从短期资本流动中获利，而不是让短期资本流动成为宏观经济稳定的巨大威胁。

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已经较高，今后在产权保护、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等贸易政策谈判方面可以采取更加支持的态度。FDI 领域进一步开放的重点是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ODI 领域需要政府帮助解决市场失灵现象，让市场自发力量成为对外投资主力军。走向浮动汇率制度是当务之急，进一步的资本项目开放需要其他改革到位后再逐步推进。

（执笔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合作研究课题组）